

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

张越 编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发生在五四时期中国史坛上影响与规模都比较突出的几个论辩问题，如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论辩，对老子和孔子生卒时间及先后问题的论辩等。

书 名：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

作 者： 张越

丛编项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ISBN：7-80647-763-2/K092.6

定 价：25.00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提倡与批评

一、关于“国故”的争论和胡适力倡“整理国故”

(一)关于“国故”的争论

(二)胡适力倡“整理国故”

二、国学必读书目之争

(一)胡适、梁启超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上的分歧

(二)《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目”引发的争论

三、对“整理国故”的阐释、批评与反思

(一)对“国故”的阐释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二)“整理国故”与科学方法

(三)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与反思

第二章 古史论战及其评价(上)

一、古史论战产生的时代背景与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

(一)古史论战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

二、古史论战的发生

(一)刘研黎、胡堇人对“层累”说的质疑

(二)顾颉刚对“层累”说的进一步论述与刘研黎
的再质询

(三)胡适等人对古史论战的意见

三、古史论战的继续

(一)柳诒徵的批评——古史论战再起波澜

(二)王国维对古史与疑古说的观点

(三)《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及对“古史辨派”
的批评

第三章 古史论战及其评价(下)

四、三四十年代对顾颉刚古史观及相关问题的不同
看法

(一)三四十年代对顾颉刚古史观的评价

(二)关于“信古、疑古、释古”说

五、新中国建立后对“古史辨派”的评价

(一)20 世纪 50 年代对“古史辨派”的批评

(二)20 世纪后二十年以来对疑古学说及“古史
辨派”的评价

(三)关于“走出疑古时代”说的分歧

第四章 两个史学理论问题的争论

一、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关于历史学性质的
讨论

(一)中国史学家对历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

初步探讨

(二)五四时期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

(三)三四十年代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争论

(四)20 世纪 90 年代的讨论

二、历史学应当求真还是致用?——对历史学功用
的不同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 记

绪 论

从古代史学到近现代史学,中国史学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近现代以来,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所造成的危机日益严重,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史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嬗变趋势。史学的变化总是与客观历史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近代史学出现的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当代史的撰述、对外国史地的介绍等方面的热潮,无不与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相呼应,既是时代影响史学所使然,也是史学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内容。然而,史学毕竟是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和学科范畴。近代以来救亡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从外部刺激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趋势,但这尚不具备传统史学转型的全部条件,换句话说,爱国主义激情还不是影响和替代学术研究的全部因素,它只是对史学转型起到了一个强烈影响的外部推进作用,史学的真正转型还需要从其理论、观点与方法等诸多史学的内部因素中产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经过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的酝酿、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初期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新的历史观的引进,到了五四时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大力提倡,才得以初步实现。因此,五四时期是中国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是传统史学步入现代史学的开始。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是“民主”与“科学”。民主与

科学促使人们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历史上圣人、帝王、显贵们曾经不可动摇的地位不再牢固,历史上被奉若神圣的经典、价值观念、说教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在学术研究方面,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成为人们所遵奉的信条,推翻偶像、拒绝迷信、摒弃成说,凡事都要问一声“为什么”,摒弃旧的历史观念,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用科学方法重新估价中国的史学遗产,是五四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亦成为史学转型的内在主因。

五四时期史学注重“求真”与提倡“科学方法”的趋势,一方面有力促进了先进的、科学的历史观在中国史坛扩大影响,是历史观的进步的基本保证,而历史观的进步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史学有条件开始真正走出旧史学的窠臼,使历史学科初步具备了现代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基本要求。这是史学转型在学术意义上的成因。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获得了重新观察与审视自己的新的视角。“五四”前后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使得史学自身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理论问题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五四”前后的学术界正处于新旧、古今、中西等众多矛盾的尖锐冲突中,史学转型初期的中国史学界还是在探索和找寻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途径,因此,观点歧异、众声喧哗、论争纷起成为五四时期史学的一大特征。

本书重点涉及的是“五四”前后发生在中国史学界的数起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论辩,主要包括: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提倡与批评,古史论战及其评价,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讨论,对历史学功用的不同认识等。其中,“整理国故”运动的论辩属学术史范畴,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整理国故讨论的实质是如何在新旧中西之间面对传统文化的复杂问题。经过讨论,如何阐释国故、国学等词的意义,如何对待国故、国学与整理国故,“整理国故”运动本身内容及走向等,与讨论之初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代表了整理国故的收获和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而论争的内容,则多是新旧文化转换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整理国故”运动

本身与史学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当时现代学科分类尚不明确之时,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国故”运动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有重要影响。关于疑古问题的论战涉及到对古史、古书的基本看法,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学术价值以及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上的更新引人注目。古史论战在兴起之时就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相关讨论断续持续于20世纪。对充斥于神话传说之中古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是疑、是信,如何疑、如何信,其中涉及到的争议问题即使到今天仍然余绪未绝。回顾八十多年来古史论辩的曲折过程,不仅对了解其发展过程有所裨益,而且对继续探讨古史真相的努力意义重大。对历史学性质的论辩和史学求真与致用的论辩均属史学理论方面,既是20世纪史学融汇中西的体现,也是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虽然发生于“五四”前后,但这些问题本身无一不影响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并且是断续持至今日。现在,重新回顾这些论战的发生、发展过程,悉心考察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议论得失,应当说是非常必要的。

五四时期的史学论辩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提倡而使建立科学的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在20世纪的首要目标,这也是引发这些论辩的一个共同因素。提倡科学,重在一种渗透到各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科学精神,而表现出来的,则是对研究中的科学方法的大力提倡。“五四”前后对史学“求真”和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要求愈来愈强烈,随着对西方学理了解的增多,中国史家更加注重中西史学结合的问题,“科学”在中国史坛被特别重视起来,而对“科学方法”的探索,成为一个突破口。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是在五四时期强调科学的时代思潮中,史学沟通中西的具体表现,实质上与历史观仍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要求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人们在这点上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分歧点在于对于究竟什么是科学的历史学有着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以及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与论辩。

其次,对历史观的接受与理解,西方新学理的影响,是造成五四时期史学论辩的共同原因。进化史观在当时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规律性怎样;历史研究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如果是求真,是否可以不用考虑任何求真以外的任何因素,甚至不惜打破几千年来的固有观念和信念,如果是致用,又应当如何处理其与求真间的关系。不同的看法分歧较大,论辩在所难免。积极引进与接受西方学理是当时学术界的大势所趋,但是面对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及变化,又将怎样看待。五四时期史家在论辩中表现出的偏激、善变的现象,均与此相关。

再次,加强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国传统史学不乏史学理论上的精彩观点,但是缺乏系统论述。五四时期史学论辩或集中于理论问题,或与理论问题关系密切。通过论辩,加强了中国史学对相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深度,这既是五四时期史学论辩的重要收获,也是促使史学转型的主要内容。

此外,五四时期的史学论辩尽管在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批评、辩难异常激烈,但总体上仍维持在一种比较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这也是五四时期史学呈多途发展、收获显著趋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的讨论学术的氛围也是后人所应当借鉴的。

第一章 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提倡与批评

一、关于“国故”的争论和胡适力倡“整理国故”

(一)关于“国故”的争论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他继续实行独裁统治，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尊孔读经，大搞祭天祭孔活动。一批遗老遗少、旧派文人闻风而动，乘机鼓吹复辟，攻击共和。各地纷纷建立了孔教会、经学会、孔道会、宗圣会等组织，打着尊孔的旗号，发泄他们对共和制的不满，要求复辟帝制，为袁世凯废除共和、独裁复辟的阴谋企图摇旗呐喊。一时间，思想文化领域被搅得乌烟瘴气，出现了一股势力强劲的尊孔复古的逆流。

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复古逆流进行了全面反击，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文化作了激烈的、彻底的批判，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由北大著名教授轮流主持编辑的《新青年》杂志，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提出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成为抨击旧文化的先锋。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新旧文化的交锋也日趋激烈，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东西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而这些问题远不是以简单的否定或肯定就能够解决得了的。

譬如,当时开展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表面上是猛烈抨击传统文化、主张全部接受西方文化的激进派或西化派和固守旧道德旧文化、主张调和中西的保守派或调和派之间的文化观的冲突,实质上却是首次对东西文明的一次深入的剖析和反思,从文化史的意义上看,“激烈的反调和论者主张‘根本扫荡’旧思想旧传统,固然是在为新文化开路;而平和持中的调和论在力倡中西文化融合,并用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文明去‘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的同时,在文化转型理论方面也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思考。”^[1]今天看来,一方面,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使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彻底改造旧文化也成为更多人的共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不再是被毫无保留的讴歌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容仍然具有生命力的观点也为人们所注意。其中,与新文化人进行争论的所谓“守旧派”,除去少数已无多少市场的思想僵化、固守旧制的顽固派外,主要是一些受到过新式教育、对西方文化颇有了解的人,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也对新文化自身进行了反思。如胡适在北京大学 1920 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中,就提到了新文化运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指出:“我以为我们现在哪里有什么文化? 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 你看最近的一期学术杂志里有一篇对于学术界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大学很有些忠实的规谏,他引了陈惺农先生对于编辑北京大学日刊的启示。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 到陈先生编辑的时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几篇,方才敷衍过去。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 后来我们想,著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的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想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胡适据此认为:“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他批评说: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他。这叫做‘普及’。”胡适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存在着的缺陷，为了克服这种现象，胡适强调：“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门径科学……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2]面对来自文化保守派各方学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挑战，胡适等人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如果要继续深入发展，就需要“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需要在认真清理旧学的基础上去“再造文明”。

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怎样看待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新旧人物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前后，对国故的阐释和争论，以及随之出现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发展蔓延开去，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关注。

章太炎是最早使用“国故”一词的人。胡适曾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3]“‘国故’二字为章太炎先生创出来的，比国粹，国华，……等名词要好得多，因为它没有含得有褒贬的意义。”⁴《国故论衡》出版于 1910 年，此后“国故”一词逐渐流行起来。顾颉刚认为：“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计划。”^[5]对于“国故”的使用和界定，因使用者的观点不同而多有歧异，然而整理国故运动却是由于对“国故”的争论而发其端，这场争论，始于《新潮》与《国故》之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1919 年 1 月，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创办了《新潮》杂志，目的是“唤

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新潮》出版后，很受进步青年的欢迎，也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几乎是在同时，黄侃、刘师培、薛祥云、张煊、罗常培等北大师生，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社，并于3月份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该刊发表的文章全是文言文，不用新式标点，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唱对台戏。《国故》月刊倡导的“国故”的观念一时也有相当影响。3月18日的《公言报》发表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文章认为，北大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首的主张新文学之人为“新派”，《新潮》杂志是该派学生所办；“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6]

针对《国故》所倡言的通过“研究国故”去昌明国学、发扬国光的观点，《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刊出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就以下五个问题作了回答和阐述：

一、什么是国故？

二、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的位置。

三、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么？

四、研究国故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事情。

五、我对于国故和国故学的感想。

毛子水认为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的论衡，国故据此可以认定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而依照毛子水自己的想法，还应当加上“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因此，他将国故定义为：

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7]

毛子水指出,那种把国故和“欧化”(欧洲现代的学术思想)列为对等地位,以及将国故视为具有神秘不可思议的技能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对于前者,他说:“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对于后者,他认为或是因为爱国心胜过诚实所致、或是因为夜郎自大的脾气所致、或是没有读书的结果,错处更为明显。毛子水是这样理解国故在世界学术上所处的地位的:

凡是学了一种科学的人,没有不知道学术史的重要的。凡是研究社会或政治等学的人,没有不知道一个大民族的历史是重要的。却有一层,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讲数学名学等历史的人,必定首先讲到希腊诸学者;讲民法的人,亦必研究罗马法。这样的例,在我们的学术史里面,实在寻不出来。还有一层,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有这些缘故,所以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8]

尽管如此,毛子水认为国故还是应当研究的。因为“国故是中国一段学术史和中国民族过去历史的材料”,“无论重要不重要,在世界学术史上,总算站了一个位置。”“倘若我们从研究国故的结果,得了他们,岂不可乐么?”“我们倘若用这样目的去研究国故,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发达的缘故,我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研究国故,养成一种‘重徵’‘求是’的心习,亦是有点好处的。”^[9]

毛子水强调,既然国故尚值得研究,那么研究国故的人则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他认为:

……就科学二字的广义讲起来,“国故学”可以算做——而且必须算做——现在科学的一种。“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

研究国故的人又有应该知道的,就是国故的性质。国故的一部分,是已死的过去的学术思想,古人的学术思想,不能一定的是,亦不能一定的非。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他,第一须把古人的意思理会清楚,然后再放出我们自己的眼光,是是非非,评论个透彻就算完事了。……

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第一件事就是用科学的精神去采取材料。凡考古的学问,和他种的学问相同,最要的事情就是有精确的材料。论断的价值,和材料有密切的关系;材料不精确,依据这个材料而立的论断,就没有价值了。……总而言之,能够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便能够用科学的精神去选择材料;能够用科学的精神去选择材料,就没有这样的毛病。^[10]

文章的最后,毛子水谈到了他对于国故和国故学的感想,再次强调研究国故必须有“科学的精神”,批评了“近来研究国故的人”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也没有科学的精神,是“抱残守缺”,而那些自命为“古文大家”的、正在那里提倡“古文”的人,他们所讲的古文,并没有国故的资格。对当时出版的讲国故学的书籍,毛子水认为章太炎的《文始》、《检论》、《国故论衡》,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都是精审的著作”,具有“科学的精神”。“至于国内讲国故学的杂志,前有《国粹学报》等,最近有《国故》,用意皆很好。但是他们里面所登的,有许多亦似乎缺点科学的精神。”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的中心观点就是研究国故必须要有科学的精神。当时倡导用科学的方法治学或研究传统学问,已

经受到相当的重视。如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1919年3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的文章，即已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朱希祖说：“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方今治科学的方法，最要者是分析、比较、综合；而尤要者在乎经验。所讲的事实，若未曾经验，但凭传说，往往流于臆测；虽有分析、比较、综合种种方法，他的基础已不巩固，是容易为人摧破的。所以我们治古书的方法，第一亦在乎经验；苟至无可经验，要用推测，亦须用已经经验的事来推测，乃不至于武断。”¹¹（这里的“经验”当指证明、证实的意思。）

在对国故的性质做了定义之后，毛子水并不否认有研究国故的必要，关键在于有没有科学的精神，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精神，那么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不仅不能够“发扬国光”，反而是“发扬国丑”。由于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针对以《国故》月刊为代表的旧派学者大力提倡“国故”、提倡“古文”的号召与言论而发的，这就必然要联系到对国故的地位、价值的判断，而毛子水把国故说成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在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重大的贡献”等，显然是把问题绝对化了，类此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看法，反映了新文化阵营中的激进倾向，尽管这种观点也未必能为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完全赞同，但是对国故如此定论的确显得十分偏颇和草率，招致国故阵营的批驳与反击在所难免。

在毛子水的这篇文章后面，《新潮》主编傅斯年写了一段“附识”：

两三个月以前,我就想做篇《国故论》,大旨是:——

(1)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采色——如梵文的发明,使得欧洲言语学上得个新生命;婆罗门经典入欧洲,便有叔本华派的哲学;澳洲生物界的发明,进化论的原理上得些切实的证据等等——亦未可知。我不是说中华国故里面有若干完全的系统,为近代欧洲所不及的;我是说中华国故里面或者有几项可以提醒我们(suggestions)。至于追摹国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

(2)所以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

(3)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馆去的运命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

(4)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

(5)研究国故好象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12]

傅斯年的“附识”写于毛子水文章之后,说明他对于毛文的观点(如反对使用“国粹”一词、研究国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等)大体上是赞同的。所不同者,是国故在世界上的地位,傅斯年承认“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